

冒鹤亭词曲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冒鶴亭詞曲論文集

冒懷辛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冒鶴亭詞曲論文集

冒廣生 著

冒懷辛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30 插頁7 字數684,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

ISBN 7-5325-0131-0

I·32 定價(精裝):16.50元

前言

冒廣生（一八七三—一九五九）字鶴亭，號疚齋，早年又號鈍宦，江蘇如皋人，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舉人。戊戌（一八九八）時參加保國會變法活動。梁啟超在冒氏著《冒巢民先生年譜》跋中稱：

丙申（一八九六）春夏間居上海，始見冒君鶴亭，英姿颯爽，氣咄咄若朝日，問姓氏，謫居，輒憶其先德巢民先生（按：指清初四公子之一冒襄，字辟疆，號巢民）言論行事，而口摹之，而目營之，而心追之。《留都防亂》一揭，越歲將三百年，生氣凜凜，尚塞於天壤。其以視法之牟拉巴、日之中山忠光，雖異地不同時，其浩然之氣，輝映若旦暮。……鶴亭之文，史家之文也。鶴亭之志，殆先生之志也。（一）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冒氏留京。當時曾被推薦應試經濟特科。因試卷中提盧梭之名被黜。閱

（一）此文失載於《飲冰室文集》，蓋梁氏戊戌東渡時，所遺佚文稿之一。

卷大臣張之洞破例在試卷上批寫，有「論稱引蘆校，奈何」等字。

其時冒氏少年氣盛、慷慨激昂，不滿清末的憤憤不振，在其詩作中有：

眼底羣公食肉才，封疆危日事堪哀。白頭不作功名想，也夢登陴殺賊來。（《與蕭敬孚夜話》，蕭即桐城蕭穆，時已年老，故謂白頭。）

在《福州晤先君寅好》詩中曰：

新交締羣紀，故國換山河。

君看赤嵌水，何日更東還？

赤嵌為臺灣地名，當時甲午戰後，臺灣被割，詩中熱烈期望臺灣他日回歸祖國。

其後在《滿江紅·京口懷古》詞十首中，其一記雅片戰爭事，詞中曰：

橫海船來江不險，轟天雷迅城都墨。枉青州、四百好男兒，頭顱擲。

伊里布，箸方失。顏崇禮，冠堪溺。問北門鎖鑰，是誰之責。

這些說明冒氏二十餘歲時，既才華卓越，又充滿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

戊戌後兩年，冒氏往來蘇州、揚州、廣州等地。在揚州佐閱童生試卷時，所評選的第一名為劉師培。

一九〇〇年，在京為刑部郎中，一九〇二年，兼任北京五城學堂史地教習，與林琴南同事，以吳肇甫（汝綸）為師。當時吳、林、冒曾合攝一影，陳衍見之，稱為「海內三古文家」。其時吳汝綸已六十

三歲，林琴南五十歲，冒氏方二十九歲。這年冒氏舉經濟特科，從刑部轉爲農工商部郎中。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曾在《國學萃編》發表《小三吾亭詞話》五卷，後編入《晨風閣叢書》一集。

小三吾是清初冒襄水繪園中一景，其得名又源於唐代元次山（結）的浯溪、嵒臺、與唐亭等「三吾」。冒氏所著詩、文、詞集及學術論著，均以小三吾亭爲名。

民國初年，冒氏曾任江、浙等地海關監督、外交交涉員，而其主要關心的却是文化事業。陳三立贈冒氏詩中曰：

抱關碌碌竟何求，不狎魚龍狎海鷗。乞食情懷天所鑒，揚芬事業夢相謀。

這是當時實際寫照。所謂「揚芬事業」，指傳播文化史料的貢獻，是有成績的。

冒氏在甌海關時，曾刻印《永嘉詩人祠堂叢刻》，其中有唐釋玄覺的《永嘉證道歌》，宋代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等「永嘉四靈」的詩集，和宋末愛國詩人林景熙的《林霽山集》等十三種。元末《琵琶記》作者高明的《柔克齋集》早已失傳，冒氏從《元詩選》、《明詩綜》及方志等書搜集叢殘，編成《柔克齋詩輯》。〔一〕《永嘉詩人祠堂叢刻》並附錄了温州清末兩學者黃紹箕、黃紹第的作品。此外，冒氏在温州又曾刊刻《永嘉高僧碑傳集》八卷及附錄等。嘉興沈曾植見後，認爲可入《續藏》。

〔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琵琶記討論專刊》中將此輯本全部翻印。

一九一七年，冒氏離開溫州，為當時農商部長田文烈聘任全國經濟調查會長，曾以學成回國的丁文江、翁文灝為第一、二科科長，開創了經濟資源的調查。

其後冒氏在鎮江海關，自出百金，與地方人士共贖金六百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順鎮江志》。書中保存了元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情況。阮元在《寧經室外集》卷一稱此書「備錄故事，多詳興廢，物產土貢，臚陳名狀……明以來絕無著錄，洵為罕觀之祕籍。」^[1]

冒氏在淮安時，僅及一年，刊刻了《楚州叢書》。唐、宋時淮安稱楚州。這部叢書從漢代枚乘的《枚叔集》，到清末段朝端著《吳山夫（玉搢）先生年譜》，共計詩文、碑釋、畫鑑、書法及專著與方志等類共二十三種，為第一集。其中《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射陽先生文存》，是其後故宮發現《射陽先生存稿》原書以前最完整的一個輯本。胡適在其《文存》三集中，對冒氏輯本有專題介紹和論述。

從上述事實看，冒氏工作職務與其所為實際，似乎不相一致。作為稅務官吏的海關人員，所做的文化學術傳播工作。西方的中國學家常把「士大夫」詞譯為Scholar-officials（學者官吏）。從歷史看，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陽明、楊升庵，以至清代的紀昀、畢沅、阮元，一直到張之洞等等，都是聲聲大者。他們對學術文化與政事兼顧，而其中不少人又都在文化上有所

〔1〕臺灣華文書局一九七〇年曾影印此書，編入《中華文史叢書》第二輯之第八種。書首扉頁上「癸亥仲秋刊」，是指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而書局編者上推為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當訂正。

貢獻。這情況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形成一個傳統，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特點。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可從當時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中去找，就是行政官吏必以通過文化考試的所謂士人來擔任，而不論其辦事能力。其利弊功過，值得作爲歷史來研究。宋、明以來有數以千百計的如此人物，而冒氏可視爲具體而微的其中之一。

抗日戰爭時，冒氏在滬，是其著作最繁富精審的時期。詞曲方面有各家詞校記、《四聲鈞沈》、《傾杯考》、《宋曲章句》、《新辭云謠集雜曲子》、《東鱗西爪錄》、《疾齋詞論》等，皆已收入本書。而其詞學理論也基本上存在於這些著作中，下文再作詳介。

冒氏生當社會變革之際，作爲一個文學家，其詩、文、詞創作的藝術水平，可說是不愧於傳統的一個優秀繼承人。其思想水平，就當時環境看，也是較進步的。此外他又是一個在學術上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對經學、史學、諸子，都有研究與著作。經學方面有《京氏易義》、《京氏易表》、《京氏易傳校記》等合稱《京氏易三種》，以及《大戴禮記義證》、《逸周書器服解》等專著，《周禮三大祭樂申鄭》、《兩漢三大祭樂用周禮考》、《納甲說》、《納音說》、《爻辰說》等文。史學方面有《蒙古源流年表》、《唐書吐蕃世系表》等。諸子方面用力最深，有宋、元以來各版本《管子》跋十七則以及《管子集釋長編》未完稿，校記散見書眉上。其他所校釋子書尚有《淮南》、《晏子春秋》、《文子》、《列子》、《賈誼新書》、《陸賈新語》、《春秋繁露》等等。各校記釋文的例言及自序與其他學術論文，冒氏曾自編爲《小三吾亭雜著》，計七十餘篇，達十五萬字，不屬於《小三吾亭文集》之內，現存有稿本。

全國解放後，冒氏被聘爲上海市文管會顧問。一九五七年來京，得毛主席、周總理接見。陳毅同志屢次邀其參加政協，而冒氏回滬後因病未能來京。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七夕）逝世於上海。

對於冒氏，綜合其總的文學水平與學術成就來說，以之與清初朱彝尊、中葉的錢大昕、後期的俞樾相較，可說是同一類型的後起者。

儘管時代不同了，歷史的發展使他的學術與傳統方法無從發揚，只能成爲文化史上過去歷史階段的一個最後標誌。然而其著作中豐富的內容與不少精闢的見解，對今天及今後研究經學史及思想史、文化史都有參考價值。這裏綜述其生平與學術時，略一提及。以下論述其詞學的內容與成就。

二

冒廣生的詞學貢獻分兩方面——早年、中年的詞曲創作與晚年的詞學理論。

冒氏自稱：

光緒癸未、甲申間（一八八三——八四），吾年十一、二歲，從母歸省，得七外祖周昀叔都轉（星譽）所著《東鵲草堂詞》。如「牆裏梨花花上月，花下闌干」，及「容易黃昏捱過，明朝還有黃昏」等句，輒能上口。（《四聲鈞沈》）

俞樾在光緒丁酉（一八九七）作《五周先生集》序言中說：

周氏本吾浙山陰人，……其兄弟八人，知名者五。

《五周先生集》是冒氏當時所編其外祖一輩五人的詩、文、詞集。「五周」指周沐潤字文之，道光進士，常州知府，行一。周源緒字復之，道光進士，安慶知府，行三。周星鑒字涑人，行五，安徽無爲知州。周星譽字昀叔，一字叔云，道光進士，官兩廣鹽運使，行七。以及周星詒字季貺，福建建寧知府，即冒氏的外祖父，行八。

「五周先生」雖是地方官吏，又都是文人學者。俞曲園在《五周先生集序》中又說：

五先生皆曠代逸才……詩文皆自能成家，不染近代浮靡之習。則此一集亦如精金美玉，其光氣固不可埋沒，竇氏《聯珠》不得專美於前矣。(二)

冒氏前文所謂「隨母歸省」，非去紹興，而是指其七外祖周星譽從廣西右江道調兩廣鹽運使時，隨母在廣州。

至於冒氏的外祖周星詒，是清末著名藏書家和目錄學家。孫詒讓光緒丙申（一八九六）爲周星詒《麻橫詩質》作跋中稱：

季貺先生學尤淹博，喜收藏異書。著錄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乾嘉諸老精校善本，三榮郡齋不足論

(三) 他們當時在紹興創立一文學團體，名益社。周氏兄弟及王星誠（字平子）、李星謨（即李慈銘字越縵）等，稱爲「益社五星」。

也……手自理董，丹黃雜選，精審絕倫。(二)

關於周星詒的文學，孫詒讓在序中又稱：

先生所作詩詞，尤多造微之作，則又竊嘆先生述造之富，非徒爲校讎略錄之學也。

所以觀縷列述以上冒氏外家的校讎目錄之學與詩、文、詞的成就，說明這些都是冒氏少年時代的文化背景及家學淵源。

冒氏生於廣州，童年皆在廣州。清末番禺著名詞人葉衍蘭（字蘭臺，號南雪，葉恭綽之祖父）是冒氏祖父一輩的友人，同治中曾以戶部郎中值軍機，後回廣州，是冒氏的詞學老師。後三、四十年，冒氏於一九二八年（戊辰）在葉衍蘭的《海雲閣詩鈔》跋中，追記光緒初年時事：

師（指葉衍蘭）一日見廣生所學爲詞，曰：此吾故人孫也。命執贊受業門下。同吾游者，時則有若姚子伯懷、潘子蘭史、黃子日初。而師獨奇愛廣生，春秋佳日，後堂絲竹，廣生殆無不與。

這是冒氏詞學的師承關係。

冒氏於一九一四年刊刻前文所述的《柔克齋詩輯》時，在跋中稱：

吾家當全盛時，歌者紫雲，楊枝有盛名於時，雖大喜大壽，演《琵琶記》不芟《食糠》、《賣髮》諸齣也。以故

(二) 周星詒藏書最著名的是明臨宋本《北堂書鈔》。其校勘學曾以陸佃《爾雅新義》校《爾雅》，以郝經《續後漢書》校《三國志》。又有《南齊書校勘記》，經我告知，中華書局曾借用，並吸取其成果。

吾十三即知留意詞曲。(二)

所謂「吾家全盛時」不是指冒氏清末所處的家庭，而遠指明末清初冒襄家中的樂部。吳梅村《冒辟疆五十壽序》中所稱：「水繪（冒襄園名）盛時，其主謳者爲阮大鍼家伶工」，即是指此。而「十三即知留意詞曲」，則說明了冒氏少年時愛好詞曲音樂的傾向。冒氏能操笛，其後中年有興時，猶能歌《長生殿·彈詞》中李龜年的「不提防餘年值亂離」以及《千鍾祿》中建文帝的「四大皆空相，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等句。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冒氏十八歲，從廣州回如皋參加縣試，爲第一名，州試第一名，院試亦爲第一名。葉衍蘭在冒氏《小三吾亭詞》序中說：

識者咸知其有異稟，稍長應童子試，縣、府、道，皆冠其軍，旋舉孝廉，名大噪。

葉序中又說：

顧性好詞，雖從余遊而時有以啓余，嘗與余言，詞雖小道，主文譎諷，音內言外，上接《騷》、《辯》，下承詩歌，自古風盛而樂府衰，六朝人《子夜》、《采蓮》之歌，未嘗不與詞合也。又言學詞當從唐人詩入，從宋人詞出。每怪近日詞家極軌南宋，黃七、秦九，已成絕響，亡論溫、李，……余建其言，未嘗不喜故人之有後也。

這時是光緒甲午（一八九四），冒氏二十二歲，中江南鄉試舉人。葉衍蘭時已七十二歲。葉序中所引冒氏之論，未嘗不是葉本人意見。值得注意的是「近日詞家，極軌南宋」一句已隱含着冒氏所見

（二）轉引自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琵琶記討論專刊》三四六頁。

的一種趨勢。這趨向與風氣，發展爲一部分詞人過分拘泥形式，字字依仿宋人四聲，作繭自縛，影響思想感情的抒發。

這一見解，一直到冒氏晚年構成其《疾齋詞論》、《四聲鈎沈》中的主要論點。

然而冒氏早年的詞學主要在創作。在《小三吾亭詞》扉頁的「詞評」中，當時詞壇老宿譚獻的評語是：「鶴亭詞格甚成就。」王鵬運的評語是：「託體風騷，含情縣邈，擬之國朝（指清代），當於竹垞（朱彝尊）、水雲（蔣春霖）間分踞一席。」

現從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的譚獻日記中又發現對冒氏詞的評論，日記中說：

方展冒鶴亭詞，愛其有得於幽憶怨斷之音，欲爲論定，而魏孝廉汝泗札來索還，遂以歸之（二）。

事實上也已作了「論定」。譚獻當時被公認執詞壇牛耳，時年已六十八歲。冒氏年二十五。老輩對後起青年的獎借，說明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優良傳統。

關於曲的方面，冒氏創作始於三十年代初期。當時在廣州中山大學、勸勤大學任經學、訓詁學教授和廣東通志館編纂。這期間作有《疾齋雜劇》，內容包括《別離廟蕊仙入道》、《午夢堂葉女歸魂》、《馬湘蘭生壽百穀》、《卞玉京死憶梅村》以及《南海神》、《雲彈娘》、《廿五絃》、《鄭妥娘》等八折，曾少量排印於一九三四年，附有史料考證等文字。

（二）見《念劬廬叢刊》一九三二年排印本《復堂日記續錄》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疚齋雜劇》載汪兆鏞、張學華、吳梅、盧前等題辭。吳梅並賦南曲一套作序，其中有「徧塵寰恨識先生晚，論詞壇孰是官、喬、馬、關」之句。盧前題辭有「青藤老去風情。聽兩岸猿啼，妙語天成。（按指明徐渭《四聲猿》劇）又到先生。把四折的《疚齋雜劇》，做一盞樂府傳燈」句。

此時又作有散曲、小令，如《題姚粟若東海揚塵圖》、《蘿岡洞探梅》、《孤征》等。關於曲的體裁規格方面，如《新斲中原音韻定格曲子》以及《中原音韻校記》、《太和正音譜校記》等學術性研究，則是在抗戰初期居滬時所作。

關於冒氏的詩作，這裏附帶提及。冒氏曲作不多，詞則二十年代所刻《小三吾亭詞》四卷約三百首，晚年詞稿未刊的也將近三百首。詩的數量包括已刊、未刊則多於詞曲兩倍以上。其早年也主要是以詩名家。在清末民初大部分人傾向宋詩的潮流中，冒氏沒有爲生硬晦澀的江西派所闕，其風格遠紹蘇、陸，近沿梅村、竹垞、漁洋（指吳偉業、朱彝尊、王士禛）一派，陳三立稱他「火傳坡公」，這也說明其不隨時流之處。然而他對江西詩的研究，從所著《後山詩註補箋》來看，其功力並非不深。關於冒氏詩及詩論，俟另專門論及。

三

這裏試爲介紹冒氏有關詞、曲的理論貢獻以及局限性等等，提供海內外學人參考、指正。

冒氏的詞學理論，主要分三個方面。其一論詞的源流發展及詞的「本體」。其二論詞的平仄四聲，反對拘泥墨守，以解放詞體，破除詞禁。其三爲對宋、元以來詞曲及有關論著的分析評論，進一步證實以上兩方面的論點。分述如下：

一關於詞的源流

冒氏說：

詞從五、六、七言絕句來。無論如何長調，祇有四個官韻：二十字，或二十四字，二十八字以外，皆增字。四個官韻以外，皆增韻也。（《疾齋詞論》卷上《論官韻》）

這是一個論述詞源的非常明確、肯定、而扼要的判斷。詞之所以有官韻以外的增韻，是由於詩變爲詞，增加字句所產生。而詩變爲詞，小令衍爲長調，其變化的規律，冒氏指出，「不外增、減、攤、破」四法。（《疾齋詞論》卷上《論增減攤破》）

冒氏舉例指出後蜀後主的《木蘭花》（冰肌玉骨）一首，經蘇東坡增字、增韻而成《洞仙歌》。歐陽修《摸魚兒》（卷繡簾）一首一百十七字，原是七絕二首增字增韻而成。冒氏闡明，「增」之法有四，一增字、二增句、三增疊、四增偏，並各詳舉例以說明。至於「減」則是「增」之對待，「攤」法有時近於「增」，有時近於「破」。「破」則如柳永詞《法曲獻仙音》「慣輕擲、慣憐惜」破爲「事須時恁相憶」，是破三、三句作六。又如柳詞《梁州令》「離愁別恨無限，何時了」，破爲「月不長圓，春色易爲老」，是破上六下三句作四、五。如此等等，在《疾齋詞論·論增減攤破》中均有詳說。

最後，冒氏更指出：「增、減、攤、破之法，既如上述，而其源則出於三百篇。」並說「概而言之，則增減之法，風多於雅；攤破之法，雅多於風。」大抵小令近風，長調近雅也。」又進一步舉例說明《國風》、《小雅》和杜詩中的增、減、攤、破。

總之，冒氏認為詞來源於唐代絕句，絕句即是詞的「本體」。而絕句之發展為詞，以至詞的長調，不外經過增、減、攤、破四種方式。至於增、減、攤、破方式的運用，可以一直溯源到《詩經》。

從文學史上看，關於詞的發展起源，從沈括〔一〕、朱熹〔二〕起，即有論述。明清以來，衆說繁興，互有同異。

冒氏明確指出五、七言絕句是詞的「本體」，而又以簡馭繁，用增、減、攤、破法說明詞體的演變過程。這是一個簡明精確而能言之成理的論點。其意義及作用究竟如何，值得今後學者的進一步深入研究論定。

二、關於詞的四聲平仄

詞是有音樂性的韻文，其用韻與字句中平仄有必要的規定，以保持音樂的美感。

〔一〕《夢溪筆談》卷五《聲律》。

〔二〕《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宋代是詞的興盛時期，那時沒有詞譜、詞律和詞韻。明、清以來，這一類書的出現，可供人們在句法、用韻及使用平仄上有所參考。然而事情發展得過分，到清末詞壇興起了一種逐字逐句必須按照宋人原句的四聲以填詞的潮流。冒氏稱之爲墨守四聲，他在《四聲鈎沈》中說：

同時吾所交納老輩，皆未聞墨守四聲之說，鄭叔問（指鄭文焯）舍人是時選一調，製一詞皆摹仿白石，迨庚子（一九〇〇）後，始進而言清真，講四聲。

所謂「墨守四聲」，就是對周清真或吳夢窗詞，不但字句及叶韻處相同，甚且對全首詞中每一個字的平、上、去、入四聲，都必須模仿相同。

這一做法又始自清初萬樹的《詞律》。萬樹曾提出：

方千里係美成（周邦彥）之字，周集名《清真》（同時，所和四聲，無一字異者。（見《詞律·發凡》）

觀方千里和（清真）詞，平仄處無一字不同。（《詞律》卷五，周邦彥《品令》詞後萬註）

余嘗謂千里和清真，四聲一字不改。（《詞律》卷五，周邦彥《應天長》詞後萬註）

愚謂美成爲樂府創始之人……千里之和清真，無一字聲韻不合。（《詞律》卷十一，方千里《側犯》詞後萬註）

對於這一種填詞字字必依古人，拘泥形式的風氣，冒氏產生懷疑，認爲：

仄韻之詞，上去可以通押，何至句首或句中可通融之平仄，乃一字不能通融？（《四聲鈎沈》）

冒氏於是以周邦彥自作同一調二詞互相比較，再遍檢當時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三家的和清